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論臨時革命政府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論臨時革命政府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論臨時革命政府一書，係按蘇共中
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院所編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八卷原文譯出。

目 次

第一篇 普列漢諾夫的歷史證據·····	5
第二篇 僅僅從下面還是既從下面又從上面動作？	18
簡要註釋·····	29

第一篇

普列漢諾夫的歷史證據

第三次黨代表大會¹通過了一項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該決議表明的正是我們在前進報²上所採取的立場。現在，我們來詳細分析一下反對我們立場的一切異議，並全面闡明代表大會這項決議的真正原則精神和實際意義。我們先從普列漢諾夫想把這個問題擺在嚴格原則基礎上的企圖談起。普列漢諾夫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為：論奪取政權問題。他批評「被規定（顯然指被前進報規定）的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為目的的策略」。事實上，正如任何一個閱讀前進報的人所熟知，前進報從來沒有提出過關於奪取政權的問題，也沒有規定過任何『旨在奪取政權的策略』。普列漢諾夫力圖用另一個臆造的問題來偷換被真正討論過的問題；為了確信這點，只要回憶一下爭論的過程就夠了。

馬爾丁諾夫最先在他著名的兩個專政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斷定：如果我黨以領導者身份來參加起義，那末在勝利時，我黨就必定要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這種參加在原則上是不可容許的，並且只能產生遭致滅亡和聲譽敗壞的結局。火星報³辯護了這種立場。前進報則反駁說：這種結局反而是最合乎願望的，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

可以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等量齊觀，是可以容許的，而沒有這種專政就捍衛不住共和制度。可見，爭論雙方在回答馬爾丁諾夫所提出的問題時，採用了兩個假設，但在從這兩個假設所得出的結論上發生了分歧。雙方所採用的假設是：（一）無產階級黨以領導者身份參加起義；（二）起義獲得勝利和完全推翻專制制度；他們分歧之點是在於對由這兩個假設所得出的策略結論的評價上。這難道與『被規定的(!)旨在奪取(?)政權的策略』相似嗎？普列漢諾夫力圖迴避被火星報和前進報所討論過的馬爾丁諾夫對問題的提法，這難道還不明顯嗎？我們曾爭論的是：既然勝利實行起義的結果是必定要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那麼勝利實行起義是否危險，是否要遭致滅亡。普列漢諾夫所表現的願望，則是爭論應當不應當規定旨在奪取政權的策略的問題。我們担心，普列漢諾夫的這種願望（它只有從要抹煞馬爾丁諾夫對問題的提法的觀點看來才是明瞭的）會成為天真的願望，因為無論過去和現在，誰也沒有爭論這個問題。

至於普列漢諾夫在其全部論證中這樣來偷換問題究竟有什麼意義，這從和『庸俗化的能手』這句話有關的一件事看來是特別明顯的。前進報所用的這句話使普列漢諾夫坐臥不寧。普列漢諾夫談到這句話竟有七次左右，他嚴厲而憤怒地使自己的讀者們相信：前進報竟敢用這個不太恭維的形容語來稱呼馬克思和恩格斯，前進報開始『批評』馬克思等等等等。我們十分明白，假如前進報講過的話，哪怕有一句與普列漢諾夫妄加於前進報的謬論相似，那麼立意要恢復馬爾丁諾夫

的名譽和『申斥』前進報的普列漢諾夫會是十分愜意的。但是，問題正好在於，前進報連一句這樣的話也沒有講過，並且任何細心的讀者都不難揭穿普列漢諾夫的面目的，他用完全不關緊要和微不足道的吹毛求疵弄亂了有意味的原則問題。

儘管回答吹毛求疵是多麼枯燥無味，但是又不得不詳細說明，這件關於臭名昭彰的『庸俗化的能手』的事實上是怎么回事。前進報是這樣議論的：我們大家都談論爭取共和制度。但是爲要實際上爭取它，我們就必須要起來『共同打擊』專制制度，——我們就是指革命的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但是這還不夠。甚至『共同打垮』專制制度，即完全推翻它也是不夠的。還必須『共同打破』將來必不可免的拚命恢復已被推翻的專制制度的一切企圖。把這種『共同打破』運用於革命時代，就正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政府。因此，用可能產生這種專政的前途來吓唬工人階級的人們，即像新火星報的馬爾丁諾夫和馬爾托夫這類人，都陷入和他們的爲共和制度而鬥爭和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自相矛盾之中。實質上這些人們是這樣來議論的：彷彿他們想限制、縮小自己爭取自由的鬥爭，就是說預先給自己劃定一塊最微薄的勝利品，即定出一種代替共和制度的殘缺不全的憲制。前進報寫道：這些人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十九（和二十）世紀革命中三個主要力量和三個主要階段的著名原理鄙劣地庸俗化。這一原理就是：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是限制專制制度以滿足資產階級；第二個階段是爭取共

和制度以滿足「人民」，即農民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第三個階段是社會主義變革，只有這種變革才能滿足無產階級。前進報寫道：「一般和整個說來，這種情形是正確的。」的確，擺在我們前面的是向這三個不同圖式化梯級的上昇運動，這些梯級之所以不同，是看在這個上昇運動中，在最好場合有哪些階級能夠伴隨我們。但是，假若我們把馬克思主義關於三個梯級的這個正確圖式瞭解為在任何一次上昇前，須給自己預先定出一個極為微小的限度，例如不多於一個梯級，假若我們在任何上昇前，根據這個圖式『為自己擬定一個在革命時代的活動計劃』，那末我們就是庸俗化的能手了。

前進報第十四期*中的議論就是這樣。於是普列漢諾夫就想在最後一句被着重指出的話上吹毛求疵。他洋洋得意地宣佈說：這樣一來前進報就是辱罵馬克思是庸人了，因為馬克思正是按照這個圖式為自己擬定了一個最革命時代的活動計劃的！

證據何在呢？證據就是：在一八五〇年，當德國的革命人民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鬥爭中遭到了失敗，未能打垮專制制度的時候，當自由資產階級已經獲得了一種殘缺不全的憲制並投到反動派方面去的時候，——總之，當德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僅只上昇到第一個梯級就停住了，再也無力上昇的時候，正是在這時候…馬克思說過，新的革命高漲將是向第二個梯級的高漲。

* 指列寧著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一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八卷，第二七〇頁。——編者註。

讀者們，你們覺得可笑吧？的確，普列漢諾夫那裏的三段論法，是有點……（這怎樣緩和點說呢？）……帶『辯證』味的三段論法哩。因為上升到第一個梯級以後，接着便是向第二個梯級的上升這話，是馬克思在具體民主革命的相當具體時機說的，所以只有『批評』馬克思的人才能把那些用一下子躍過（在特別成功組織和實行起義時）兩個梯級的可怕前途來吓唬我們的人稱為庸人了。

是的，是的，對馬克思的『批評』是件不好的東西……而對馬克思的不成功引證也是一件不大好的東西。馬爾丁諾夫不成功地解釋馬克思，普列漢諾夫不成功地替馬爾丁諾夫辯護。

讓任何一個善於找毛病的讀者也不要從我們的話中得出結論：彷彿我們不顧社會實力的對比關係如何，而宣傳『旨在』必須躍過梯級的『策略』。不是的，我們沒有宣傳任何這樣的策略。我們所反對的僅是那些善於談論共和制度和把革命實行到底，而同時又用參加民主專政的可能性來吓唬自己和別的人們對無產階級的影響。在前進報第十四期中我們已經指出，在目前革命高漲之後，反動勢力的統治無疑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現在爭得的愈多，我們將來在可能的（和合乎願望的）民主專政時期愈益無情地鎮壓和消滅反革命勢力，那末反動勢力從我們這裏奪去的自由將愈少。我們在前進報第十四期中又指出，這種專政的問題本身，只有當假定發生了下述這類事件，即民主革命發展到完全推翻專制制度，發展到建立共和制度而不半途而廢時，才有意義。

現在，我們放下關於『庸俗化的能手』的事，轉而來談談普列漢諾夫所引證的著名的『告同盟書』⁴（一八五〇年三月共產主義者同盟⁵中央委員會向盟員宣佈的）的內容。在這個非常有意思和特別富有教益的『告同盟書』（它值得完全譯成俄文）中，馬克思攷察了一八五〇年德國的具體政治形勢，指出新的政治爆發的可能性，斷定在發生革命時，政權必然要向共和主義小資產階級民主黨轉移，並分析了無產階級的策略。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在革命前、革命時以及在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取得勝利後的策略分別加以研究後，主張必須創立『工人黨獨立的秘密組織和公開組織』，並全力反對『把這種工人黨組織的作用降到官方資產階級民主黨附屬品的地步』，強調指出武裝工人、成立獨立的無產階級近衛軍、無產者嚴格監督背叛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黨的重要性等。

在整個『告同盟書』中，不管是關於工人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或是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都絲毫沒有談到。普列漢諾夫由此便得出結論說：馬克思『顯然連想也沒有想過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能夠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共同致力於創建新社會制度』。這一結論的邏輯是蹩腳的。馬克思並沒有提出工人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而普列漢諾夫却作出結論說：馬克思是以絕對的否定精神在原則上一般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馬克思談的僅是具體形勢，而普列漢諾夫却作一般結論，而完全不去具體地攷察問題。其實，只要瞧一下『告同盟書』中被普列漢諾夫遺漏的若干地方，就足以看出他的結論的全部錯誤了。

『告同盟書』是根據兩年革命時期即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的經驗寫成的。馬克思把這個經驗的結果表述如下：『同時（即正是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從前的堅固組織却大大地減弱了。大部分直接參加過革命運動的成員，都曾認為祕密結社活動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單是公開活動就已足夠了。個別小組和組織（Gemeinden）已在放鬆自己跟中央委員會的聯系，以至漸漸完全斷絕了這種聯系。結果，當德國民主黨即小資產階級黨日益組織起來了的時候，工人黨却喪失了自己唯一鞏固的基地，至多也只是在個別地方爲了本地的目的還保存着組織的形態，因此一般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支配和領導的地位。』*在『告同盟書』的下一頁上，馬克思聲明說：『目前即將爆發新的革命，…極爲重要的是，工人黨必須儘量有組織地、儘量一致地和儘量獨立地行動起來，才不會再像一八四八年那樣受資產階級利用和受資產階級的牽制。』

請你們好好考慮一下這些確切論斷的意義吧！在兩年公開革命以後，在柏林人民起義勝利以後，在召開了革命國會以後，在一部分國土處於公開起義狀態之中和政權暫時轉歸革命政府掌握以後，馬克思斷定，革命的人民遭到失敗，在黨

* 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von März 1850, K. Marx: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1885, Anhang IX, S. 75. (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一八五〇年三月；卡·馬克思著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真相記，一八八五年版，附錄九，第七五頁。——編者註。) 引文中着重點全是我加的。

的組織方面，得勝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失敗的是工人黨。難道這還不極為顯著地表明，在當時這種政治形勢下根本就沒有必要提出工人黨參加政府的問題嗎？在兩年革命時期中，馬克思公開出版了九個月最革命的工人黨報紙，在這兩年革命時期後，他不得不肯定：工人黨完全解體，在總的洪流中完全沒有多少明顯的無產階級支流（波仁⁶的工人友誼會是微不足道的），無產階級不僅落到受資產階級支配的地位，而且落到受資產階級領導的地位！顯然，當時經濟關係還十分落後，幾乎沒有大工業，沒有任何規模稍大的獨立工人運動，小資產階級獨佔統治地位。不言而喻，在這樣的條件下，瞭解具體形勢的作家關於工人黨參加臨時政府的可能性甚至連想也不能去想的。不言而喻，馬克思應當在其『告同盟書』中諄諄教誨（請原諒我用這個詞）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們了解現在我們看來是初步常識的真理。馬克思應當證明，在選舉時，工人應不依賴資產階級民主黨而單獨提出自己候選人的必要性。馬克思應當駁斥民主派的空話，即彷彿工人之分離是在『分裂』（請注意這點！可以分裂的僅是昨天還是統一的並繼續在思想上是統一的東西！）民主黨。馬克思應當預告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不要為這些空話所迷惑。馬克思應當以同盟中央委員會名義約許只要一有可能，就召開工人黨代表大會來集中工人俱樂部，——而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年代中，還沒有條件可以設想召開工人黨獨立代表大會！

由此所得出的結論是很明顯的：馬克思在其著名的『告同盟書』中根本沒有涉及無產階級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在原則上是否可以容許這個問題。馬克思專門研究的是一八五〇年德國的具體形勢。馬克思之所以隻字不提共產主義者同盟參加革命政府的問題，是因為在那時的條件下，不可能產生以工人黨名義爲了民主專政的目的而參加革命政府的思想。

馬克思的思想是這樣的：我們，即一八五〇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沒有組織起來，我們在革命的第一個時期遭到了失敗，我們完全受了資產階級的牽制；我們應當獨立地組織起來，一定地、無條件地、無論如何獨立地組織起來，——不然的話，在加強了自己組織和強固的小資產階級黨將來勝利時，我們同樣會當尾巴。

馬爾丁諾夫的思想則是這樣的：我們，即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組織成爲獨立的政黨，現在我們想對沙皇制度的堡壘實行首次衝擊，想領導小資產階級人民。但是，假若我們把衝擊組織得很好，並且，——萬勿這樣，——勝利地實行衝擊，那末我們也許必得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或者甚至參加民主專政。而這種參加原則上是不可容許的。

普列漢諾夫想認真使人家確信，援引馬克思就能替馬爾丁諾夫辯護嗎？大概普列漢諾夫把火星報的讀者們當孩子看待。而我們則只能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馬爾丁諾夫主義却是另一回事。

* * *

爲了結束關於『告同盟書』的討論，還必須說明普列漢諾夫下述的一個錯誤意見。他正確地指出，在一八五〇年三月，當『告同盟書』寫成時，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已經衰老，而社會主義革命在他看來已經『完全臨近』了。馬克思很快就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在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五日他就已和沙佩爾（沙佩爾和維利赫成爲同盟內的少數，並退出同盟）發生分歧，沙佩爾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義或烏托邦主義的影響，竟如此之深，以致說：『我們應當即刻獲得政權，要不然我們就可以躺下睡覺』。馬克思反駁沙佩爾說，不能拋開實際條件，而僅把自己的意志看作革命的原動力。無產階級可能還要經歷十五、二十以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和國際衝突，『這不僅是爲了改變這些條件，而且還爲了改變無產者本身，使自己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⁷。普列漢諾夫簡略地敘述了馬克思觀點的這種改變並推論說：

『即使他們』（即發生這種『改變』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民主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仍將佔統治地位這一假設，就已決定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然而正因爲如此，他們就會更堅決地斥責社會黨人參加小資產階級的政府的』（火星報第九十六期）。

普列漢諾夫的這一推論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曾不止一次地責備馬爾托夫和馬爾丁諾夫把社會主義專政和民主專政混淆起來，而這一推論正好歸結爲這種混淆。在一八五〇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專政區分開

來，或者更確切些說，根本就沒有談到民主專政，因為那時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已經衰老，而社會主義已經臨近。因此他們當時也沒有把最低綱領跟最高綱領區分開來。如果要作這種區分（如像由於『社會革命黨人』不瞭解這種區分，我們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和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義進行鬥爭時所作的那樣），那末就必須特別弄清楚社會主義專政和民主專政的問題。普列漢諾夫沒有這樣作，因而他的行動是不澈底的。他選擇了一種轉變抹角的說法，一般地談論『社會黨人參加小資產階級政府』，這樣就正是暗中用社會主義專政的問題來代換被明顯、肯定、確切提出的民主專政的問題。他（我們用前進報*的比較）把米勒蘭⁸與加里弗一起在社會主義革命前夜時期參加內閣和瓦倫與保衛並保衛住了共和制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參加革命政府混為一談。

一八五〇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已經臨近了，因此對民主勝利品估計不足，那時他們覺得由於小資產階級民主黨的必定勝利，這些勝利品是牢實可靠的。二十五年後，即在一八七五年，馬克思指出德國的國家制度是不民主的，是『蒙着國會外衣的專制制度』⁹。三十五年後，即在一八八五年，恩格斯預言在未來的歐洲震動¹⁰中，德國政權會轉到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手中。由此得出的結論恰好與普列漢諾夫

* 指列寧著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一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八卷，第二五四頁。——編者註。

所要證明的東西相反：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瞭解到民主制度比較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必然性，那末他們爲了鞏固共和制度、爲了澈底消滅專制制度的一切痕跡和完全掃清爲社會主義而戰鬥的場所，會賦予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以更大的意義的。他們會更加嚴厲地斥責那些在民主革命前夜用革命民主專政的可能性來吓唬無產階級的尾巴主義者。

普列漢諾夫自己感覺到，他這種以曲解『告同盟書』爲基礎的立場是軟弱的。因此他預先謹慎地聲明說，他不企圖以自己的證據來把問題澈底弄清，——雖然他除了與題無關的證據外，根本沒有引用任何別的證據，甚至也不想弄清前進報對問題的具體提法，就作『詳盡無遺的』絕對結論。普列漢諾夫想竭力強使前進報既接受『批評』馬克思的願望，又接受馬赫和阿萬那留斯的觀點。他的這種暗算只能引起我們一笑而已：既然普列漢諾夫不能從前進報的真正論斷中給自己找出攻擊對象，而必須從既與前進報又與所考察的問題絲毫無關的題目中來捏造攻擊對象，那末他的立場必定是糟糕的了。最後，普列漢諾夫還援引了一個證據，他覺得這個證據是『無可反駁的』。實際上，這個證據（一八九四年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¹¹）糟糕透了。

從普列漢諾夫對這封信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可惜，普列漢諾夫沒有引用這封信的全文，也沒有指出，這封信是否發表過和究竟發表在哪裏），恩格斯那時應當向屠拉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與小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區別。這樣便原形畢露